

清末白话文运动

胡全章 著



报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丛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清末白话文运动

胡全章 著



报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丛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末白话文运动/胡全章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6

(报刊史料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丛书)

ISBN 978 - 7 - 5161 - 6401 - 3

I. ①清… II. ①胡… III. ①白话文—汉语史—研究—中国—
清后期 IV. ①H109.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46939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曦
责任校对 周晓东
责任印制 戴宽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装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6.25
插页 2
字数 253 千字
定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清末白话文运动研究”（11YJA751021）最终成果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
“清末白话文运动研究”（2011-ZD-019）最终成果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
“期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11&ZD110）阶段性成果

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
“报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2012-CXTD-02）阶段性成果

河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序 言

关爱和

进入 20 世纪后，报刊成为文化传播的主要渠道和方式。报社、学校、学会、沙龙以及近代中国舆论媒介共同构成中国社会的公共空间。《报刊史料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丛书》旨在以 20 世纪中国报刊的兴起、发展为切入点，描述 20 世纪在西学东渐、政权更迭等复杂政治与文化背景下中国新文化与新文学的重建过程，揭示 20 世纪文学活动、文学传播和报刊媒介、文学编辑、市场及读者之间的联袂互动。

《报刊史料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丛书》的研究对象是文化与文学的结合物，入手于报刊，立足于文学。它有可能打破作家生平的评述、文学名著的分析、文学体裁分类的传统书写模式，将报刊与文学互动的描述保持在制度、观念、思潮、流派的宏观层面。

《报刊史料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丛书》以 20 世纪新思想新文学的重建为研究对象。文学史叙述的主要任务，是使过去的历史得以复活。书写者借助自己的主体精神解读重现历史，在总体上坚持大叙事文学史理念，以现代化作为历史叙事稳固宏大的思想框架，以近代、现代、当代为历史叙事起承转合的三大时间平台，探求一百年中国人的精神涅槃，建立报刊与文学共生共兴的叙述与知识体系。近、现、当代三大时间平台分属不同的政权形态，不同政权所形成的文化文学机制是绝然不同的。依据三大政权把 20 世纪划分为近、现、当代，是一种革命话语。这是我们的书写必须面对的话语体系。但依据现代性的标准，我们还将有另一种话语体系，这就是现代化的话语体系。文化与文学的现代性，是伴随资本主义的形成，大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以现代知识体系为基础并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与

文学表达。现代性可以赋予 20 世纪中国文学另一个完整的叙述框架。从这一框架出发，中国文化与文学的现代化一以贯之而不曾因政权的更迭而中断。

20 世纪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重建是在古与今、中与外两对既相互冲突矛盾又相互融合支撑的文化语境中进行的。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重建，有民族的和西方的两大思想资源，重建的过程是民族传统文化文学和西方舶来文化文学融合生成的过程，充满痛苦，也充满活力。重建之后的新文化新文学，既有中国基因，又有外来血脉。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和中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一样，是活生生的“这一个”。“重现”、“重新复活”中国新文化、新文学重建过程，书写活生生的“这一个”，就是通过文学透视“中国经验”与“中国制造”。理论自信并保持理性判断，饱含同情而张扬批判精神，是《报刊史料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丛书》研究应该确立的写作立场。

就传播与文学知识体系的建立而言，《报刊史料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丛书》的主要任务是建构。书写者须在对历史文本的阅读交流中，不断形成视阈融合，产生新的成见成果。这些成见成果对已有的文学史可能带来解构与重构。上述目标完成的基础是报刊史料。对史料的掌握、分析、归纳、研究的水平，决定建构、解构、重构的能力。本课题在总体上坚持大叙事文学史理念的同时，不拒绝穿越学科、现象，寻找整体的裂隙与历史的偶然，寻找思想碎片。从报刊史与文学史重合的时间节点上，聚焦问题，发现细节，以富有趣味的历史发现，呈现历史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历史书写的根据主要是史料文本。史料文本与史家的主体精神是相互作用的。对史料文本，要善于阅读发现，更要善于归纳发明。学术预设的立与废，取决于在文学史观指导下作者对史料文本的把握驾驭。书写者在纷纭繁杂的史料文本面前，要具备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善入善出的能力。

在世界范围内，20 世纪是一个工业时代与后工业时代接踵而来的时代。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发展，面临着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社会语境。精英意识形态、商业意识形态、大众消费意识形态并存合流，精神生产、

商品生产、大众娱乐的界限趋于模糊含混。这一特点和趋势，要求我们在书写中，既要遵守文学史学科的传统规范，防止泛文学化，又要注意上述趋势对文学发展的深刻影响。

《报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丛书》着眼于报刊传播与文学发展互动研究，是增加现代文学史观察维度的学术探索，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深化和拓展。书写者应注意著述的学术创新、学术水准和学术价值。处理史料文本，应注意独特性、创新性、前沿性。对学术界已有的成说，转引他处的文献，要一一注明。在行文过程中，提倡文从字顺，简明扼要，求同存异，清新稳妥。避免人云亦云，概念堆砌，虚话套话，佶屈聱牙。

“虽不能之，心向往之”，愿与丛书的写作同人共勉。聊以为序。

2015年4月20日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清末白话文运动之理论自觉	6
第一节 清末白话书写之理论自觉	6
第二节 清末白话文学之理论自觉	12
第二章 主要阵地与中心位移	17
第一节 清末白话报刊述略	17
第二节 文话大报之白话专栏与附张	25
第三节 清末小说期刊与新小说	29
第四节 戏曲舞台与改良新戏	35
第五节 中心位移：由南方到北方	38
第三章 民间力量与官方资源	43
第一节 清末白话文运动的民间力量	43
第二节 清末白话文运动的官方资源	52
第四章 清末白话文运动与启蒙救亡思潮	57
第一节 作为启蒙思潮的白话文运动	57
第二节 国民意识与国民性批判	62
第三节 民族民主革命思潮	69

第五章 清末白话文运动与语文改革思潮	75
第一节 清末白话文运动与拼音化运动	75
第二节 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之合流	80
第六章 清末白话文运动与白话文学思潮	86
第一节 白话文运动与小说界革命	86
第二节 清末白话文学思潮之兴起	90
第七章 清末白话报刊之文学考察	97
第一节 缘起与范围	97
第二节 清末民初京津白话报刊小说作家群	100
第三节 清末白话报刊改良戏曲	106
第四节 清末白话报刊歌诗	117
第八章 清末报刊白话文	126
第一节 清末白话演说文	126
第二节 清末白话游记文	133
第三节 清末白话述学文	139
第四节 清末白话文之文学性	147
第九章 清末白话书写之语言特征	152
第一节 清末白话书写的通俗化与口语化	152
第二节 清末白话书写的文话化与书面化	160
第三节 清末白话书写语体的近代化	168
第四节 清末白话书写的规范化意向	176
第十章 拟想读者：“他们”与“我们”	183
第一节 问题之由来	183

第二节	“尽天下之民而智之”	184
第三节	由启蒙心态到自我言说	190
第十一章	清末白话报人和白话文作家	195
第一节	白话道人的白话报与白话写作	195
第二节	刘师培的白话文	200
第三节	北方报刊白话文大家杨曼青	207
第四节	蔡、陈、胡、钱的早期白话报活动	212
结语	219
参考文献	231
附录	清末白话报刊年表	236
后记	249

引言

在 20 世纪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人们提及“白话文运动”总是言必称“五四”，而对清末白话文（学）潮流则轻描淡写，贬多褒少。尽管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已有学者指出晚清确实存在一场有相当规模的“白话文运动”^①；然而，时至 20 世纪末年，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主流叙述线索仍然沿用五四白话文运动领袖胡适的历史评判，一刀斩断了清末白话书写与现代白话文衔接的可能性。而事实上，清末白话文运动意义重大，不仅是研究中国政治、社会与思想文化近代化进程不能忽略的一环，更是研究五四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不可绕过的重要环节。

时至今日，尽管白话文运动并非五四之特产已成为学界的普遍认知；然而，人们对清末白话文运动的整体形态及其历史流变仍然缺乏明晰的认识。受五四新文化人的眼光视野之影响及史料建设工作严重滞后之制约，清末白话文运动研究至今仍未在学界引起足够的重视，研究力量和研究基础都非常薄弱。今人的文学史论著中述及清末白话报潮流和白话文运动，未见第一手材料、仅凭一点有限的第二手材料便开口说话，或不假思索地沿用五四新文化人之观点的现象，仍然屡见不鲜，乃至习以为常。

后五四时代，以胡适、周作人为代表的五四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当事人建构新文学历史谱系时追溯其渊源，均提及不可能视而不见的清末白话报潮流和白话文现象。然而，无论是胡适那部被后世史家誉为近现代文学史开山之作的名著《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3），抑或是周作人那部影响深远的北平辅仁大学的讲演记录《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

^① 参见谭彼岸《晚清的白话文运动》，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

均极力强调白话文（学）的开创是在五四时代；虽然他们知道和承认清末白话的流行，却只承认其目的在“宣传革命”和“开启民智”，而否定其在文学和语言上的探索意义，更否定其与五四白话文（学）的联系，从而在清末白话（文）和五四白话（文）之间划出了一道至今仍难以逾越的观念上的鸿沟。以胡适和周作人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家将清末白话与现代白话文割裂开来的看法，对后世学界影响至深。20世纪后半叶大陆学界关于中国新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的叙述线索，大都延续这一思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清末白话文运动给予较大关注者谭彼岸。其《晚清的白话文运动》一书，从全国推行的白话报、大量印行的白话教科书、传播新思想的白话文学三方面，论证了清末确实存在一场有相当规模的“白话文运动”，并且指认其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前驱”，以为“有了这前驱的白话文运动，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才有根据”。^①然而，谭氏对这场运动最为重要的环节——白话报刊材料——挖掘不多（仅十余种），极“左”的政治语境（批判以胡适为首的资产阶级唯心派之流毒的政治思想运动）亦限制了著者持论的客观性和学理的严谨性。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著作——复旦大学中文系1956级中国近代文学史编写小组编著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对“晚清的白话文运动”设专节介绍，将其定性为“反帝反封建”不彻底的“改良主义”，视其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之软弱性、两面性在文化上的表现；认为五四白话文运动与晚清白话文运动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前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后者则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②

改革开放以来，对清末白话文运动及其与五四白话文运动之间的历史关联予以持续关注的学者是夏晓虹。1985年，她在《五四白话文学的历史渊源》一文中将晚清白话文运动定位为以开启民智为目标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一部分，指出其作为语文改革运动在推动语、文合一方面切实发挥了作用。2006年，夏晓虹、王风等著《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从晚清到“五四”》一书，将自晚清到20世纪40年代的文章观念与白话文

^① 谭彼岸：《晚清的白话文运动》，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页。

^② 复旦大学中文系1956级中国近代文学史编写小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78—188页。

变迁作为一个整体对象来考论，其中涉及晚清以降的拼音化运动与白话文运动的兴起、白话文（包括政论文与学术论文）的书写对于五四文学革命、国语运动、现代文体意识以及现代散文与论说文走向的历史意义的考察，这一研究视野和整体构架，极具启迪意义。2010年，夏晓虹《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官方资源》一文则为探寻清末白话文运动发生的内部支持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开拓了研究的新径。

台港学者在清末白话文运动研究领域取得的成绩不容忽视。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1997）一书设专节考察清末白话文运动，指出白话报的出现和发展是清末政治和社会运动的重要一环，视其为清末民初文学革新运动重要组成部分，且直接开五四白话文学之先声。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2001）一书通过大量报刊史料，从白话报刊与宣传品、阅报社、宣讲与讲报、演说、戏曲等方面再现了清末白话文运动的生动场景，其着眼点则集中在清末下层社会启蒙运动。罗秀美《近代白话书写现象研究》（2005）一书从文化背景、理论建构、启蒙教育、大众传播、文学创作等角度考察了近代白话书写现象，试图再现其面貌及意义。然而，三部著作的重心和兴趣均不在语言和文学考察，对白话报刊史料亦涉猎不多。

新时期以来的几种重要的近代文学史著作，均未给清末白话文运动以应有的重视；即便谈及近代白话文（学）状况，亦轻描淡写、语焉不详。^①

① 以任访秋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郭延礼著《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及樊骏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近现代文学编》之“近代文学”卷三部20世纪80年代以来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近代文学史著作为例：任著对清末以降的白话报洪流和白话文运动未予论列；郭著设专节论述“近代白话文热潮”，白话文理论举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之例，顺带提及黄遵宪、陈荣衮，白话文范例举《演义白话报》（1897年）之《白话报小引》一段，肯定近代白话文热潮为五四白话文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和语言基础，同时指出近代白话文倡导者对白话的认识观念模糊，提倡白话文却并不反对文言文，且存在“我们”和“他们”之分，认为这些都是近代资产阶级文学之弱点与局限性，是近代文体革新不彻底之表现；樊著设专节介绍“白话文运动与早期白话文”，白话理论述及黄遵宪、梁启超、裘廷梁、陈荣衮之提倡，白话文作者举林白水为代表，肯定清末白话文运动推动了文体改革，在观念和实践中为五四白话文运动开风气、探道路、陶铸领袖人才，认为其理论上之致命弱点是只把白话文当作工具而不视为文学，且在文言和白话的使用上存在“我们”与“他们”之别。可见，主流中国近代文学史著作对清末以降的白话文运动之文学史意义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认识上亦未对胡适、周作人之见形成大的突破。

现代文学研究界则将焦点集中于五四白话文运动，言及近代，亦只视为五四之先声而顺带述之，未能正视清末白话文运动的历史存在及意义。^① 语言学界至今亦未出现针对清末民初白话与白话文研究的专门著述。

五四之后，以胡适、周作人为代表的五四一代学人对清末白话文运动历史功绩有意无意的遮蔽与贬低，是有其特定历史语境的。胡、周之谈论“新文学的源流”，宁愿扯上一千年前的禅门语录、三百年前的公安文论，也不愿意承认近在眼前的清末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新运动，这一忽略清末而远溯宋明的舍近图远之举，实乃一种远交近攻的战略战术，当时有其现实之需，而背后潜隐的则是五四一代学人严重的心理障碍。五四一代新文学家崛起于清末文学革新运动和白话文运动余波之中，为确立自己这代人的历史地位，胡适们都在有意无意地贬低乃至抹杀上一代人——尤其是清末文学革新运动和白话文运动倡导者和实践者——的历史功绩。时至今日，这种心理障碍按说在学界已经不复存在，然而人们在清末白话文运动的一些基本认知上却并未超越五四一代学人。

对文献史料的全面梳理、深入发掘、整体把握与客观分析，是从事研究工作的基本前提。五四一代学人的论断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现实之需和心理障碍，难以保持客观公允的历史态度，可说是真知与偏见并存。新中国成立之后，前30年的有关论断有着更为特殊的政治气候、历史语境和更为严重的心理障碍，很多结论自然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后30年，学界对前人的观点或接受或扬弃，观念上有较大转变，认识上有许多提高，却至今未对相关文献史料作过完整、系统而认真细致的发掘整理工作。人们对清末民初白话报刊、白话书籍和白话文的数量、质量、历史形态等基本情况都很茫然，对当时白话理论主张、报刊白话书写的语言特征及其流变轨迹、文类形态、白话文学（包括小说、戏曲、歌诗、散文等）创作

^① 时至今日，现代文学史家大都承认清末文学革新运动和白话文运动与五四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之间的历史联系，如当下最具代表性的现代文学史著作——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即肯定“晚清已经开始的白话文运动亦为后来文学革命大力倡导白话文造成一种蓄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但全书述及清末白话文运动仅此一句，对其肯定也仅限于“蓄势”。

面貌、白话报人和白话文作者之基本状况等也不太清楚，对其传播方式与接受影响之状况亦不甚了了。在这种见木不见林的窘况下，谈论起来难免捉襟见肘、以偏概全、语焉不详，在很多看法上重拾（或略加修正）前人（恢复名誉的文化界名流）的论调，也就在所难免。

清末白话文运动是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课题，近代政治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新闻史、民俗学史、语言学界和文学史学界等研究领域，都可从各自的研究视角透视这一时代思潮。限于主客观原因，本著主要从清末白话文运动之理论自觉、主要阵地与中心位移、民间力量与官方资源、启蒙救亡思潮、国民性批判、语文改革思潮、白话文学思潮、白话文体探索、语言特征与流变、拟想读者与实际受众、白话报人与白话文作家之代表人物及其与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历史关联等角度，对清末白话文运动展开较为系统的考察与探索。其他方面的研究工作的展开，则有待于学界同人的共同努力。我相信，随着全方位的研究工作的展开，清末白话文运动所蕴含的多方面的历史意义，将会逐步揭示出来。

第一章 清末白话文运动之理论自觉

从1887年黄遵宪提出“言文合一”思想，到1898年裘廷梁标榜“白话胜于文言”，再到20世纪初年刘师培着力打破语言雅俗界限，循“天演之例”倡“语言文字合一”之说，清末白话文运动先驱者在近代白话书写的理论倡导方面建树颇多，体现出近代白话书写的理论自觉意识。1903年，梁启超又进一步提出了俗语文学必将取代古语文学的文学进化史观，以及俗语文体必将被“凡百文章”普遍采用的语言文学发展观。至此，清末之提倡白话，逐渐从启蒙教育扩大到文学革新领域，有识之士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古今中外语言文学发展史莫不循着“语言文字合一”趋向演进，“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文学进化发展的“一大关键”和必然趋势^①。自此以后，在启蒙新民的旗帜下，白话文学不仅获得了与文言作品并驾齐驱的资格，以白话书写为主体的小说戏曲甚至被抬举为“文学之最上乘”，白话文学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目为文学进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一节 清末白话书写之理论自觉

早在1887年，黄遵宪就在成书的《日本国志》中参照日本国语运动经验，明确提出“言文合一”主张：“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他纵览西洋各国及东洋日本语言

^① 参见饮冰《小说丛话》，《新小说》第7号，1903年9月。

文字和文学变革发展之大势，敏感地意识到语、文合一是中国语言文字发展的一条路径，并寄希望于他日“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其用意在于“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①“言文合一”思想导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各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逐渐改变了古拉丁文造成的言文分离状态，以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等各自民族的方言土语为基础，实现了书面语与口头语的统一。作为外交官的黄遵宪最早接触到这一思想，“余闻罗马古时仅用拉丁语，各国以语言殊异，病其难用。自法国易以法音，英国易以英音，而英、法诸国文学始盛”^②。黄遵宪此处所言的“适用于今”提出了文体语体的近代化变革要求，“通行于俗”则指出了文章语言变革的社会化路径。黄氏所著《日本国志》具有强烈的用世之志，意欲借助史书形式记述日本明治维新成就，曲折表达救时思想。然而，该著虽于1887年定稿，却迟至甲午败绩、马关签约之后的1895年秋冬之际才刊行于世。《日本国志》的问世，对于民族自信力遭受重创之后渴望了解日本而苦于无籍可考的国人来说，不啻是渴逢甘泉，一时风行天下，在知识界起到左右风会的巨大作用。黄遵宪提出的言（口头语）文（书面语）必须合一、行文必须“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主张，比五四时期胡适提出同类主张，整整早了三十年，开清末和五四白话文运动之理论先声。

1896年，梁启超作《沈氏音书序》，视“民智”为“国强”之根基，视言文合一为开民智之必要手段与途径。梁氏以为：“古者妇女谣咏，编为诗章，士夫问答，著为辞令，后人皆以为极文字之美，而不知当时之语言也。”^③他对“后之人弃今言不屑用”之现象和起于秦汉以后的“文言相离之害”痛下针砭，认为这是“中国文字能达于上”而“不能逮于下”之症结所在。这是在为提高“今言”的社会文化地位寻找历史根据。梁

①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三十三《学术志二·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46、347页。

② 同上书，第346页。

③ 梁启超：《沈氏音书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页。